

治 国 史 鉴 十 讲

运新宇 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治国史鉴十讲/运新宇著.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9. 1

ISBN 978 - 7 - 5626 - 1711 - 2

I. 治… II. 运… III. 政治—研究—中国—古代 IV. D092.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2425 号

治国史鉴十讲

运新宇 著

出版发行:国防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邮 编:100091

电 话:(010)66772856

责任编辑:王立东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19.75

字 数:27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序

这是我在国防大学指挥员班“领导与管理”选修课程中的一部讲课稿。原来的题目是“中国古代治国的理论和实践”。其目的就是本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原则,使指挥员班的学员们,能够更多一些了解历史文化,拓宽人文视野,充实文化素养,以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吸纳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教训,提升思维层次,增强领导能力和水平。课程讲授以后,受到了比较广泛的肯定和好评,有的课目被学员评为国防大学优质大课。为了突出历史的镜鉴作用,集结出版,定名为《治国史鉴十讲》。

由于是讲课稿,本书有这样一些基本特点:

一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讲稿既讲了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精要,又讲了“四大盛世”的特点原因,还讲了矛盾和危机的处理方略,尤其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为了体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讲稿中努力把措施和制度结合起来,把人物和事件结合起来,把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把方略和效果结合起来,以求让人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规律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有个更全面、完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二是宏观和微观的统一。着眼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大视野,来分析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本着读史治史当观大要得失的原则,在比较系统地介绍中国古代治国理论和实践中,突出重要思想、重要时期、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举措与重要制度,以增强针对性。如在中国古代治国思想中主要介绍了儒、道、法三家的治国思想;在盛世特点中主要介绍了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康雍乾盛世”这四大盛世;在安邦治国政治智慧中主要介绍了西汉的贾谊、三国时的诸葛亮、唐朝的魏征和宋代的赵普这

些人们认识比较一致的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及其身上所体现的政治智慧;在改革变法中主要选取了秦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和宋代王安石变法几次标志性的改革变法运动;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主要介绍了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历代监察制度的主要特征等。

三是史和鉴的统一。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考虑:首先就是讲历史绝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单单是为了增加历史知识,而主要是为了古为今用,从中学习借鉴有意义的经验教训,因此每篇讲稿都提出了自己的分析见解;其次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梳理,而不是人云亦云,努力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实事求是的解读;第三是述评结合,每个重要事件和问题都提出自己的基本观点,每个课目讲完后都有一个基本的归纳和启示。十讲的最后一讲是“关于历史王朝兴衰周期率的思考”,可以视为全书的总结性思考,是对封建社会总的发展特点和规律的认识。

四是学术性和通俗性的统一。由于是讲稿,在坚持学术性的同时,尽量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增强文章的可读性。有些地方对故事性较强的内容,为了保持其相对完整性和生动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叙述。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点评,也注意语言的生动和形象,注意到人们的听课和接受习惯,尽量采用相对鲜活的表述方式,以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如讲述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中国古代统治者自律意识、危机应对的战略策略时都尽量用人物、故事、情景来增强课堂效果。

五是吸收成果和独立思考的统一。鉴于讲课主要是成熟知识的梳理传授,而研究则重在不同观点的探索阐发,所以在重大史实和观点上主要吸收了史学界认识比较一致的成果,同时注重自己对这一个问题理性思考,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因而本书稿形成过程中,不但认真阅读了《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鉴记事本末》、《二十五史精选》、《四库全书精选》等大量的历史元典,也认真学习了《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等重要教程教材,还吸纳了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如《中国

古代治国要论》、《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中外历史干部学习读本》等相关内容,在这里也一并表示感谢。同时更重要的是在阅读学习吸收基础上,通过个人的思考,力求形成自己的疏理风格、逻辑体系、基本观点和感悟心得。

由于本人的水平所限,讲稿中肯定有许多地方不够严谨、规范、准确,甚至有疏漏、偏颇、错误,敬请各位读者赐教。

作 者

2009 年 1 月

目 录

第一讲 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精要	(1)
一、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
二、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4)
三、中国古代治国思想演进的特点和规律	(30)
第二讲 中国历史上“盛世”的形成、特点和启示	(34)
一、西汉“文景之治”：拨乱反正，无为而治	(35)
二、唐太宗“贞观之治”：居安思危，谨慎求治	(41)
三、唐玄宗“开元盛世”：革弊惩恶，锐意整治	(49)
四、清“康乾盛世”：乾纲独揽，励精图治	(54)
第三讲 中国古代主要的选官制度及启示	(66)
一、以“世袭”为根本特征的世卿世禄制	(68)
二、以举荐为主、考察为辅的察举制	(74)
三、以“门第”为重要甚至是主要选拔依据的 九品中正制	(82)
四、以考试作为选官唯一标准和途径的科举制	(84)
第四讲 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改革与启示	(95)
一、秦商鞅变法	(96)
二、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107)
三、北宋王安石变法	(112)
第五讲 中国古代治国安邦政治智慧钩沉	(129)
一、贾谊在稳定西汉政权中体现的政治智慧	(130)
二、诸葛亮在治理蜀汉中体现的政治智慧	(135)
三、魏征在佐成“贞观之治”中体现的政治智慧	(142)
四、赵普在“造我宋之家法”中体现的政治智慧	(147)

第六讲 中国古代统治者的自律与行政规范	(156)
一、《帝范》、《帝鉴图说》与封建专制皇帝的自我约束	(157)
二、《臣轨》、《官箴》与封建专制官吏的自律意识	(170)
第七讲 中国古代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概要	(181)
一、秦汉时期的创制奠基：三公九卿制	(182)
二、隋唐时期的高度成熟：三省六部制	(192)
三、北宋时期繁复中的主体：二府三司制	(200)
四、金、元时期的重要变化：一省六部制	(204)
五、明朝强化君权的产物：内阁六部制	(206)
六、清代绝对王权的极端发展：军机处制	(209)
第八讲 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危局与战略应对	(215)
一、政治危局的基本类型及原因	(215)
二、历代王朝危局应对的经验教训	(224)
第九讲 中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主要特征	(248)
一、监察机构完备而严密	(248)
二、监察法规系统而全面	(254)
三、监察方法多样而具体	(258)
四、监察惩治严厉而苛刻	(262)
五、监察作用重要而特殊	(266)
第十讲 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	(273)
一、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循环现象	(273)
二、新旧王朝更替的基本途径	(275)
三、新王朝建立后的主要矛盾	(286)
四、历代王朝处理矛盾的基本特点	(295)
五、历史上王朝兴衰周期率形成的几点重要原因	(299)
主要参考书目	(303)

第一讲 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精要

中国古代治国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异彩纷呈，一直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中的主流。它不仅对古代中国社会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对今天的治国理政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由于其内容过于庞大，不是一两堂课就能够讲完的。有一个说法我很赞成，就是在海量信息的今天，一堂高质量的大课不在于给人们更多的信息，甚至于也不在于给人们更新的信息，而在于给人们更有价值的信息。所以，今天我只是讲其精要，也就是讲它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我讲三个问题。

一、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古代的治国思想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的。从历史上看大体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时期，也就是夏商周时期。这是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起源和基础阶段。其要害是有了治理国家的意识和思想理念。有的同志可能说，不是还有原始社会吗，为什么从夏商周说起？因为原始社会还没有出现国家，所以那时还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治国思想。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国家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一个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公共权

力的设立”^①。这两个东西在禹时都有了，叫“茫茫禹迹，划为九州”^②；“夏有乱政，而作禹刑”^③。可见当时已经有了“按地域治理”和“公共权力”特别是“刑”的概念。商时“尊神敬鬼”，认为国家要治理好，必须“率民以事神”^④，符合了神的意志，也就治理好了，奉行典型的以崇敬天命鬼神为特色的治国原则。所以那时“占卜”和“巫祝”的作用很重要，因为它们是天人联系的介质。而西周则发生了变化，“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⑤。也就是这时更强调要靠人来治理。他们认为人的重要性比鬼神高，主张“明德慎罚”，保民致孝。所有这一切，开创了治国思想的先河。用现在的话说，都在思考着怎样能治理好这个国家，为其日后的臻于成熟奠定了基础。所以说它是起源和基础阶段。

第二阶段，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国古代治国思想迅速发展并臻于高度成熟时期。这也是最重要的时期。所有研究历史的人有一个共识，都认为春秋战国是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如果有人讲到“轴心时代”，那是特指春秋战国。它的主要标志是两个：一个是涌现了以老子、孔子、孙子、管子、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余秋雨曾讲过公元前五世纪是个出圣人的时代，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孔子三个伟大人物思考着三个大的关系，而使这一时期的思想领域异彩纷呈，格外辉煌：释迦牟尼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而创立了佛教、亚里士多德思考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创立了古典哲学、孔子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而创立了儒学。其实他的这种说法，只是极而言之，因为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不只是这几个人，但他们的确是比较杰出的代表），他们对人类所关切的基本问题各自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看法；第二个标志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儒、道、墨、法等重要思想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167页。

② 《左传·襄公四年》。

③ 《左传·昭公六年》。

④ 《礼记·表记》。

⑤ 《礼记·表记》。

派。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诸子百家”。“诸子”是各家的代表人物（四库全书记载的是187个），“百家”是指各种思想流派（主要是10个流派）。在这些思想流派中，对有关治国安邦、经国治军问题的探索始终是其学说的主体。所谓“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①。这些治国理论的系统完善，实际上已经规范了经国治军的主要原则与具体途径，对后世治国思想的发展一直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德国有个大学者叫做雅斯贝尔斯，写过一本《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的书，他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人类依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创造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②所以我们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治国思想形成的最重要时期。

第三阶段，秦汉时期。这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形成时期，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特点是，确立了整个封建社会治国的规模与架构，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治国理想和现实目标的关系。“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③等思想的出现和实施，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还有一个与先秦时代最大的不同，它们是通过国家机器的权威力量，而被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在锲而不舍的教育和灌输下，成为社会各阶层广泛的心理认同。后世封建社会的治国思想，虽说不断发展，但不过是对该时期治国思想的扩充与丰富而已，已经有了“万变不离其宗”的特点。包括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统一度量衡，实行郡县制等都是这一时期形成的。这一时期是把治国的理论变成了实践，并取得卓越成果的时期。实事求是地说，中华“大一统”的事实和概念都是这一时期形成的。有些分裂势力讲，中国实际上早就应该分成七个，也是影射战国时的情况。台湾学者柏杨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规律性现象，就

① 《淮南子·汜（sì）四）论训》。

② （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序言，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③ 《汉书·董仲舒传》。

是“大一统”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一个重要标志是，凡是那些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帝王，都把“统一”作为“隆治”的最高境界和追求目标。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有人说中国历史上真正统一的时间很短，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严格地说，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而春秋战国时期还不是这样，那时还有小国寡民的思想。

第四阶段，经隋唐五代、宋辽金元，迄至明清时期，这是中国古代治国思想持续丰富、不断充实的阶段。从根本上说，这一时期虽然很长，但没有提出具有全局性的新的思想来，而是对现有思想的不断强化和固化，进而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内涵，以至于把孔子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叫做“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人们不上学则已，上学则必须先拜孔子，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康乾诸帝“乾纲独揽”的治国理论的提出（电视剧《康熙王朝》中的那句歌词“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大体上也反映了他当时的那种豪气），更把封建专制发展到了极端的地步。到了清朝，那真是专制，内阁的权力也大大削弱了。这一时期出了几个著名的皇帝，如康熙是“千古一帝”，乾隆更牛，号称“十全老人”。但这时并没有出现著名的宰相，这一时期的相权（这一时期是取消了丞相制的，内阁首辅也只能说是类似丞相。讲丞相、宰相是人们的习惯称呼）是很小的，都是“喳”（也就是照办）了，但是具体办事机构很精干，权力不大，效率很高，上书房、军机处是这一时期的特殊产物。实际上这些机构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这标志着传统治国思想到清朝时期已进入最高也是最后阶段。

二、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形成体系的就有十家之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家：儒、道、法，了解了这三家治国思想，也就了解了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大要。下面我分别作个介绍。

（一）儒家治国思想

儒家治国学说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主体内容之一，自西汉中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它始终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统治思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其治国思想基本内容如下：

一是内圣外王的思想。内圣是儒家治国思想的逻辑起点，外王是儒家治国思想的追求目标。所谓“内圣”指的是在内心自我修养，以达到一种圣贤的境界；而“外王”是指天下国家要行王者之政，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儒家强调只有“内圣外王”相统一才可以担当治国使命。“内圣”在治国理政的链条中居于首先和中心的位置。儒家是家国统一论者，他们认为，治天下的前提是先行修身、齐家，为此它提出了理性的治国思维模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个概念，也是儒家治国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①，正心是根本。由于在治国中统治者是主宰，因此正心，统治者必须率先做起。于是正人必先正己遂成为儒家治国思想的经典含义。孔子的言论就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先正己而后正人的治国思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②；“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③。儒家把此称作为“自然之理”：“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④。在儒家那里，“内圣”和“外王”是互为表里的，只有在思想上达到了“内圣”（也就是道德境界极高），在行为上才能实现“外王”（当官治理好国家）。因此，统治者“修身”治己，是治国的起点或中心环节，“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⑤。我们现在很

① 《礼记·大学》。

② 《论语·颜渊》。

③ 《论语·子路》。

④ 《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

⑤ 《礼记·中庸》。

多人不大懂得这一点，以为当官主要是管人的，其实当官首先是管己的。治人、治物、治国、治天下都是治己的外化和扩大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统治者应该成为道德的楷模，使民众有所效仿，以实现治国管理的理想境界。这一点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二是德主刑辅的思想。这是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内容，也就是以德治国，德治为先，辅之以刑。以仁为本，以德治国，是儒家思想的中心命题。仁政是核心，德治是达到仁政的手段。以德治国的根本含义，是要突出道德在治国上的主导作用，讲求以道德礼义引导而不是以行政约束、刑罚惩治来安民定邦。儒家认为道德礼义方为治本，而政令刑罚仅仅可以治标，即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这就是说，在政治统治方面，如果只用政令来教导他们，用刑法去约束他们，老百姓也可以免于犯罪，但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如果能够用教育来感化他们，用道德规范来约束他们，老百姓不但不犯罪，而且还知道犯罪是可耻的，这样就能提高人们的道德品质，改善社会的道德风尚。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孔子强调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国君能够以“德”来统治老百姓，他就会像北斗星一样，坐在那里不动，而别的众星就会围拱着他。所以明智的统治者，都应该坚持“德治”立场，在治国中贯彻“任德不任刑”的原则。

孟子强调“仁政”，使“德治”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孟子认为，在治理国家方面，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和道路，一个是他所赞成的“王道”，另一个就是他所反对的“霸道”。他反对一个统治者用强力手段，使老百姓服从，主张用道德感化的方法，使老百姓心悦诚服。他说：“以力假人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① 《论语·为政》。

也。”^① 孟子所说的“力”，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刑罚”的强制；他所说的“德”，就是人们所说的“德教”。意思是说力服不是真服，德服才是心服。汉代陆贾、贾谊等人进一步分析了刑罚和道德的本质作用，讲得很有深度。贾谊在《治安策》中分析认为：“凡人之智，能见已然（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见未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他对道德教育的作用很推崇，认为“贵绝于未萌，而起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因此，道德教育和感化的目的，就是要“以德去刑”，所以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勿讼乎。”贾谊认为一个社会的安危，都是有許多事情不断积累而造成的，“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仪治之者，积礼仪；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仪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导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者。导之以德教者，德敬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贾谊这篇鲁迅称作“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的《治安策》，是他写给汉文帝的治国纲要。毛泽东说，这篇文章“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强调“德治”的重要、对德治与法治的不同作用的深刻分析，是这篇论文的一个主要内容和指导思想。

但我们还必须看到，儒家思想在强调“德”的同时，不是不要“刑”，而是要把刑作为补充手段，是以“刑”达到“德”的目的。这决不能颠倒。在儒家看来，刑罚不能作为治国的主导手段，但却可以作为“德化”的有益补充，高明的统治者在治国方面应该拥有两手，文武并用，恩威兼济，德主而刑辅，先礼而后法。在孔子活着的时候，郑国发生了“盗”乱，郑国对此进行了镇压。《左传》中记载了这件事，说孔子知道后，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宽和猛的相互关系的思想。据《左传》记载：郑子产有

^① 《孟子·公孙丑上》。

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地名）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孔子听了这件事之后，发表了这样一段感慨性评论：“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层关系亚圣孟子认识得也很明确，他说：“徒善不足以自存”，“徒法不足以自行”。到了荀子的时候，这一思想又有了极大的发展，他认为教化与刑罚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而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则是最好的模式：“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励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俭而百姓不一。”^①德主刑辅是儒家治国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也体现了在治国理政上深刻的辩证思想和政治智慧。

三是民重君轻的思想。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本论。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在人和神的关系上，提出“重民轻神”的思想；第二层含义是在君和民的关系上，提出了民重君轻的思想。其核心论点是：国家为君主之本，庶民为国家之本，所以安定民生为政治之本。^②孔子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奠基者，他建立“仁学”，核心宗旨便是“爱人”，主张“亲亲而爱民”^③。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的这一思想有了极大的发展。孟子“民本论”的典型表述为，“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国家的大格局中，人民是大头，有了人民才有国家，有了国家才有君主。当君主的只有有了这个概念，才能当君主；只有笼络住人心才能当牢君主，坐稳江山，保住社稷。后来就发展为“得民心者

① 《荀子·富国》。

② 刘泽华等主编：《中国古代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0页。

③ 《论语·阳货》。

④ 《孟子·尽心下》。

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思想，也发展为“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思想。有一些学者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是指得“士”心，不完全正确，应该说也包括老百姓，光“士”是载不起舟的，好多封建王朝是被农民暴动或者说是农民起义推翻的。当然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儒家的民本思想与后来的民主思想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儒家那里是没有民主思想的，他们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儒家的民本思想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更是两码事。他们的重民还是为让它能够载舟，而非乘舟；是替民做主，而不是让民做主，甚至于也不是同治（共同治理）。说到底是一种统治手段，不可过分推崇。民重君轻在本质上说，是在国家稳定的结构中，民是重头，是基础，安全的统治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不然就要翻船。切不可理解为，他们把民众看得比统治者还高贵还重要。也就是不能把羊看得比牧羊人还重要是一个意思。世界上真正以人为本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且他们的“本”就是人民群众，就是被压迫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有一段名言：“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口号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国际歌的第一句话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被压迫的人”。对此我们一定要深刻准确的认识到。但即使如此，“民本”观毕竟是承认民众生存前提下带有阶级调和色彩的统治理论，儒家对它长期坚持与弘扬，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四是中庸和谐的思想。这是儒家治国思想的世界观基础和理想的治国模式。儒家强调“极高明而道中庸”，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也就是说以“用中适时”，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为基调的“中庸”理论，是儒家哲学的最高命题，也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方法论。孔子最早提出“中庸”的概念。在孔子看来，讲求原则性、稳定性、适应性，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前提，所以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页。